

文化强国需要战略布局

——专家研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屈 茜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中国是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却不会说我们是文化强国。”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文资办)、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高书生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上说,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要有战略,否则,这个目标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为了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构想,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大目标,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于日前举行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知名文化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策略与路径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打好文化大发展的“地基”

“现在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高书生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但供给却远远跟不上。其中,既存在着总量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着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结构不平衡,反过来又加剧了总量不足的矛盾,要想解决总量的问题,必须得扩大生产能力,要扩大生产能力就必须得增加投资。“所以说,我们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定和大投入是相匹配的,包括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包括产业当中各种投资者的投入,或者叫投资。”

高书生认为,“十二五”时期是文化发展、文化建设打基础的时期。文化要想跨越式发展,就跟我们建高楼一样,地基一定要打好。这个地基在哪儿呢?分析起来就是一个布局的问题。布局当中既包括了事业和产业的布局,也包括城乡布局、区域布局、功能布局、企业主体的布局等方面,也包括市场布局,既要有商品市场,也要有要素市场。所以说在整个“十二五”文化规划当中,处处体现了我们如何做好战略布局的问题。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怎么样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问题。”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说,“从基层的实践当中我感到,文化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布局问题,也是当前仍然阻碍文化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主要就是重文化产业,轻文化事业。”

不科学的文化发展方式,特别在基层各级政府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少数地方政府不顾文化发展规律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一些虚假繁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应该正视。另一方面,本来应该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发展,由于长期欠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老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没有错,但是忽视甚至是轻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种短视行为,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这种倾向

的实质,有的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有的仍然是以抓经济建设的思维方式在抓文化建设,是唯一GDP的思维方式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于群说。

打好对外传播的“名片”

“‘文化软实力’这个词,我个人一直理解它有两层意义:对内是凝聚力,对外是影响力。而影响力主要是指它可传播的产品、数量和渠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尹鸿表示。

尹鸿分析,如今我们的渠道建设应该说做得非常好,但为什么影响力不足?核心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力量不够“软”,体现在对外文化上的也是硬实力。观察美国的对外政策,尽量是通过第三方来进行文化渗透和对外文化传播,消除政府这只手的有形性,通过第三方这只无形的手,把政府的东西软化了。

“事实上最好的文化传播,一定是在满足被接受者的需求。经济学有一句术语:我要把我的需求转化为你的需求,这是最好的传播,而最差的传播就是我永远把我的需求当成你的需求。”尹鸿说。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进行了一组数字对比,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0.3%左右,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占到了10%,美国达到25%。

“当我们中国的大人、孩子喜逐颜开地看着老鼠和唐老鸭、本能的对外政策,已经严重干扰了他们面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时必须的真诚和感动。这种“反弹”无疑是片面和偏激的。

一切都在变,变化是世界的本质。在电影这日新月异的形式艺术中,今日弄潮儿,明天绊脚石,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电影理论前驱钟惦柴曾一针见血地谈到“但凡超越性,均有局限性”。反之亦然,岂有不曾超越、先进、鲜活过的“局限”?如果断言发展了的后代电影一定处处比前代先进,“进化论”也就沦为荒谬。今人哪怕不屑一顾的所谓“局限”,也无一不是前人绞尽脑汁努力达到的艺术结果。

一、继承传统艺术样式,又富时代气息

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始终保持着谦恭和热忱,也就守住了平和与本真。该剧真正做到了“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一个民营企业能够不计得失,创作、演出、拍摄这样一部主旋律作品,以河南剧种讲述山西英雄,以传统戏曲阐释革命历史,确实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剧目贵在:

二、挖掘革命英雄人物,歌颂崇高奉献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1947年3月26日,在听说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毛主席

鼓舞人心。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由物质市场转到精神产品市场,而精神产品市场是观念的竞争。思想和观念的竞争,是当前核心价值建设需要关注的最基础的东西,这是在自由竞争、在个人权益充分发挥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说。

“要有战略设计,在政策建设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流的战略。”张晓明说,还有技术问题,应特别关注新媒体时代。因为我国在新媒体方面真正走在世界前面,新媒体产生新的消费业态,发展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可能是扩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平台,在这个领域我们就不仅仅是数十万个作家,而是全部的草根大众,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权的大益已经通过新技术,每一个掌握了新技术的人都在自我落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新的制度和政策怎么进一步创新还得再研究。”

打好提升软实力这一仗

“任何国家都需两条腿走路,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如果硬实力不行,国家可能一打就垮,但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国家可能不打自垮。”张国祚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首先是增进主流文化的精神感召力,引领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建构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次是增强流行文化的市场吸引力,满足不同接受群体

的消费需求,建构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机制;再次是加强大众文化的社会凝聚力,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念,建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信仰;还有扩展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力,缝合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取向,建构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普遍共识;最后是汇聚无形文化的心理驱动力,弥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对立,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话语体系。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文化发展自身有方式转变的问题。”高书生说,文化发展一定是大文化发展,而且这个大文化一定要深入到大创作的体制,既包括文学艺术创作,也要包括学术创作,还包括网络文化的创作,既要面向国内也面向国际。同时是大生产,一定是从过去手工业式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一定是大消费,既包括公共文化消费,也包括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消费。最后要形成一个大贸易格局。现在推动文化走出去,我们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发展文化贸易,通过贸易的方式,通过推动文化产品的出口,通过我国文化企业海外的投资和经营,来带动、推动文化走出去。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中国发展文化一定要针对现实、面向未来。这就需要突出核心价值,把文化发展的制度与路径设计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之中,同时要解决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等传播问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才可望得到切实提升。

时 评

眼下,戏剧剧本创作的“剧本荒”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近两个月见诸报端的就有宋宝珍《“剧本荒”让戏剧伤不起》、厉震林《话剧不能成为影视的“剩饭剩菜”》等。

“剧本荒”并非传媒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近年来一再被人们旧话重提。上述报道对“剧本荒”问题的剖析可谓切中肯

綮。综合戏剧界一些人士的认识,发现“剧本荒”首要的问题是好剧本数量太少。号称“原创”作品虽不算少,亮眼的却不算多;翻排经典的舞台作品不少,能有一定超越、创新的却很少。反而有的在艺术创新的“度”把握不当,前不久,一部根据梅派经典剧目翻排的作品就广遭质疑。小剧场舞台相当活跃,艺术创作却良莠不齐。它们中间,快餐式创作相对更加多见,品位不高,融入所谓的娱乐元素,生硬制造一些戏剧性的矛盾和情节。

第二个较突出的问题是,剧本缺失人文精神。剧本的艺术质量被人忽视,场面性的炫目演出日趋强势。思想弱化、主题平庸、创意贫乏、人物扁平的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宋宝珍提出,剧作家面对商

品经济的大潮,面对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及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失去了直面与判定的能力,对人性的复杂性失去了探索的锐气。如此一来,戏剧的精神诉求明显弱化。

与剧本缺失人文精神相关涉的是我们舞台创作认识上的误区。有的舞台剧与影视攀比,戏不够,舞美凑,乃至放点白烟、滥用灯光、人海战术来凑的都有。这不能不说是艺术创造中的急躁、浮躁,影响了文本的创作。这也难怪,尽管戏剧是门综合艺术,“戏剧舞台需要

回归文学”的呼声开始逐渐强烈。我们应该认识到,戏剧不能一味搞形式革新而忽视剧本内容。

针对舞台创作,笔者认为仍需要解决或调整好与生活的关系。举例来说,大凡成功的剧作家都是写生活的高手。近期著名编剧孙德民的话剧《雾蒙山》、《日头日头照山乡》都成功创造了鲜活的农民群像。他笔下的

人物不是“编”出来的,带有鲜活的生活气息,自然亲近人民,具有艺术感染力。从“山庄戏剧”一路走来,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无不体现他的艺术睿智以及社会责任感,给了我们启示与思考。另外,应提醒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剧作家待遇应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剧本发表缺少阵地,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兼发剧本的文学刊物,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戏剧关闭门扉。另外一方面,是人才队伍的老化和流失。据不完全统计,吉林、河南、广西等省区的专业戏剧创作人员,大都以数十人计。当下,剧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创作一个剧本的收入,根本无法和一集电视剧的收入相比。在戏剧生产机制内部也是“轻剧本创作、重演出营销”。可以想见,这只能加剧剧作家流失,剧目水平下降。

戏剧创作整体力量的加强,要以剧作家为本,以剧本为本,这才是剧本创作的源头活水。近年来,戏剧的创作问题已经得到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一些省市出台了重点剧本创作扶持办法,强化戏剧队伍,青年编剧的培养计划已经启动……尊重剧作家的艺术劳动,保住作品质量,这方能为戏剧生产注入不竭动力。

动 态

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高昌)5月15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金台饭店举行。令狐安、逢先知、董学文、李志宏、有林、郑伯衣、王朝柱、李准等100多人参加了纪念和研讨活动。

与会者认为,《讲话》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说,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理想、境界低下的倾向,一些作品散发着柔软、苍白的、浓重的商业气息。这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素质造成的,但深究起来,无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结果。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郑伯衣说:“在《讲话》和毛泽东的其他文艺论著

中,理论和方针政策是融为一体的,理论是指导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概括。方针政策是行动的要求,是对实践的具体规定。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结合,决定了这种理论不是书斋之谈,它是紧密结合实际,是从实际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际的理论。”著名剧作家王朝柱认为从理论视角分析,《讲话》有着坚实的哲学根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这两个最根本的命题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艺最根本的理念。同时,也批驳了当时在国统区、延安及各根据地流行的一些言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发行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没有哪一篇文章像《讲话》那样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说:“我是在《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步入文艺殿堂、学习文艺创作的。《讲话》中最具生命力的唯物史观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50年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

本报讯 (记者刘茜)今年9月9日,北京语言大学将迎来五十年华诞。日前该校召开新闻发布会,校党委书记李宇明、校长崔希亮介绍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办学历史、学科建设,以及本次校庆活动安排。

北京语言大学创办于1962年,它的前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组建的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作为一所对外国留学生进行和慕的另类。即便困难重重,即便和者寥寥,即便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也将选择不遗余力地歌唱像《铡刀下的红梅》这样有担当的艺术作品。

张清常、王还以及翻译家袁树仁、傅惟慈等老一辈学者都曾经在该校任教。截至目前,该校已经为176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约15万名毕业生,在促进中外友好往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50年来,学校在保持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优势的同时,积极发展相关学科,由来华留学生语言培训学校发展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基地。

该校50周年校庆活动以学术活动为主,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探索与方法创新研讨会、第三世界大学孔子学院论坛、APEC区域语言教育与汉语高端人才培养论坛等。

悲壮的史诗 理想的救赎

——评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

朱寒汛



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旨在以刘胡兰精神激励全党 and 全体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直到赢得人民战争的完全胜利。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仅有白求恩、雷锋和刘胡兰三人,刘胡兰是其中惟一的女性。

任何优秀的民族,都需要英雄精神的滋养。有代表性的英雄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缩影和风向标,刘胡兰精神像雷锋精神一样,永远激励着我们。

我们经常谈论,当前社会出现了诚信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那些光怪陆离、触目惊心的事件和反馈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风俗。社会的某些精神领域需要净化和救赎,而我们在当前影视作品主流中看到更多的是以放

中国戏剧第二十届梅花奖、中宣部第九届“五个工程”奖、2006—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二名等荣誉已经说明至今已上演1700余场的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的分量。同名电影又以大幅的戏剧想象、倒叙闪回的电影语言,艺术地丰满了英雄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前后经历。

这部作品是时隔近40年,继《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作品之后,八一厂出品的又一部戏曲电影。近年来,在人才济济的豫剧舞台上,“二度梅”获得者王红丽和她的小皇后豫剧团以该剧异军突起,在全国挑剔的豫剧戏迷心中唱响,绝非偶然。

一、编剧宋西庭富于戏剧张力的文本
刘胡兰的故事虽妇孺皆知,上世纪50年代也有过同名电影,但感觉深入和具象的艺术展现仍然不够,这是对象的英年早逝、事迹单纯造成的。剧中特派员台词“儿童团长,不也是个儿童”抓到了要害。英雄少年,首先是少年,刘胡兰有少年心气,也有少年心思,更有少不更事,然后才有英雄萌芽和英雄转变,英雄壮举才可信。几次闪回恰到好处,合理地解释了孩子为何能身着薄衣,在漫天风雪中屹立一夜,独自面对强大的敌人。行至高潮,刘胡兰与奶奶生离死别,件件小事细说,更有催人泪下的效果。在主旋律影视作品,信仰的纯洁性必须牢固依托信仰的合理性,合理性是纯洁性的骨骼,更是感动没有艰苦生活体验的人们基础和保障。

此外,编剧文笔凝练而又不失优美的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如特派员说:“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刘胡兰说:“我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胡连长说:“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三句俗语虽意思相近,但此处不觉繁冗,因为从三人嘴里说出来,非常符合他们的身份、性格,以及当时针锋相对的状况,效果极其流畅自然,这是精心打磨的结果,难的是无雕琢痕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王红丽等艺术家超凡的唱功和舞台表现力
王红丽的演唱嘹亮清激、明快优美、吐字清晰、活泼奔放、节奏铿锵,激越时有金石之音,婉约时有阴柔之态,悲愤时如怨如诉,极具感染力。如“从此后,我把它擦得亮又亮,揣得紧又紧。亮又亮,紧又紧,天天贴在身……”欢快自如,很像《花木兰》中“谁说女子不如男”唱段;再如掩护顾县长突围时在山巅大唱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一展北国清新,将少女刘胡兰的临危不惧展现得酣畅淋漓;尤其是刘胡兰与奶奶分别时的高潮戏,“奶奶、奶奶呀……”字字哭腔,惨烈无比,非常动人。应该说,称王红丽所诠释的刘胡兰形象是动静相宜而又神大于形,正为合适。特派员扮演者王兴刚的表演从容不迫、驾轻就熟。

我国的戏曲电影向来是重演不重拍,具体在该剧中,电影的独语镜凸显了一些戏台上不易察觉的问题:文本当中塑造被压迫者的革命意识形成不够扎实,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境界的继续伸展;大量的中景、特写平行镜头使得画面调度略显呆板。在电影语言的参与感与创作感上,确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然而,我们却更讶异地看到技艺出众的艺术家们的自我修养。王红丽等人眼中那几乎是给人“时光倒流”错觉的清澈与坚定,非常具体。这固然与王红丽和她的小皇后豫剧团长期演出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密不可分,同时,又与他们长期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办平民剧团、走平民化道路的宗旨密不可分。